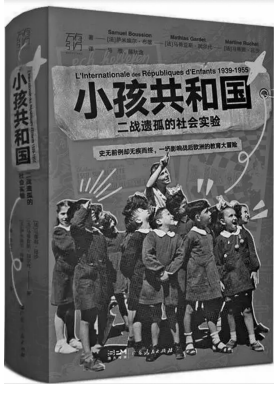
# 一场影响战后欧洲的教育大冒险

□王淼



《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

[法]萨米埃尔·布雄、马蒂亚斯·加尔代、马蒂娜·吕沙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

如果说战争意味着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那么，二战带给世间的重大灾难之一，便是留下了大量遗孤——这些遗孤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或者失去父母，或者与亲人失去联系，或者因战争致残，或者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他们都是深受伤害的懦弱无助的存在，而如何安置这些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遗孤，让他们得到关爱、受到教育并接受人道主义的救助，则成为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小孩共和国》一书，即是一部关于二战遗孤的著作。本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巴黎第八大学教育学讲师萨米埃尔·布雄、巴黎第八大学教育史教授马蒂亚斯·加尔代以及日内瓦大学社会文化史副教授马蒂娜·吕沙。三位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士特罗根举办的一场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会聚了当时欧美各国的教育界和慈善界精英，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战后受伤害儿童的身心重建。本书即围绕特罗根会议，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分别讲述了特罗根会议之前对受伤害儿童的救助情况，特罗根会议期间重新定义新教育模式所引发的争议以及特罗根会议所引起的影响，从而全面概括了当时教育救助机构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为了写作本书，三位作者翻阅了大量包括会议记录和观察报告在内的档案资料，走访了许多尚在世的当事人，收集了诸多相关照片、电报和其他文件，可谓完整再现了二战前后国际社会对受伤害儿童进行救助的过程。

在这场全球冲突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对受伤害儿童的救助者来自很多国家，背景也各有不同，其中有神父、牧师和医生，也包括不少心理学家、教师和开明的教育家。他们均秉持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即有责任去弥补战争对无辜的孩子们所造成的伤害，对孩子们的救助则应该超越地缘政治的划分，超越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界限——而与各种物质救助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这些受伤害的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更要把他们培养成和平世界未来的公民。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所谓“救助”，很可能象征着在以成人为主导的政治项目上披上一层儿童的外衣，孩子们的话语是被深度建构的，只是作为集体的话语呈现，孩子自身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特罗根会议的主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即以人道主义和新的教育模式构成救助的驱动力，尽量给予孩子们充分的自主权，让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社会意识，发挥个人能动性和团队合作意识，这是建立“小孩共和国”的理念与初衷。

事实上，对受伤害孩子的救助起始于战时的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多有参与，但当时的救助工作主要由志愿者发起，救助范围集中在物质领域和卫生领域，并未过多地考虑教育问题。随着战争的规模日渐扩大，这些救助机构或者被迫关闭，或者难以为继，直到战争后期乃至战争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对受伤害儿童进行救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有更多的国家积极参与进来，进而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特罗根会议，号召世界各国抛开地缘政治的成见，进行一场有意义的社会实验：将二战中数以百万计的孤儿组织起来，形成属于他们的自治“共和国”，让他们肩负起各种社会职责，学习互爱和理解，“学会尊重其他文化的特别之处，感受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以过上正常的生活，重新融入主流社会。

当然，因为时代政治等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国际社会对于“小孩共和国”的实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难以为继——战争结束之日，即是冷战开场之时，诚如1950年在里昂举行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会议主持人杰维茨基所说的那样：“‘儿童村’、儿童营、不同国籍儿童的聚集场所，不是通过话语建立的，而是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工作、将全世界儿童的团结变为具有生命力的现实。只要给孩子们提供见面的机会，他们就会知道，让各国分裂、进入对立阵营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大人。”

# 打开一扇观察“人世间”的窗口

□李钊

《『打工人』纪事》

主编：沈燕妮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年11月

个人的身影似乎总被淹没在时代洪流里，但作为“打工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不管社会如何变迁，他们的平常生活能让人感受到不同时代浪潮下脉搏跳动的力量。《“打工人”纪事》是一部由普通人书写的纪实作品集，书写的对象有我们生活中时常接触到的海鲜店老板、水果摊摊主等，也有离我们生活较远的“复活”宠物店店主、雪地骑手等，虽然每个人的生活和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但他们所经历的曲折离奇、暗流潜涌的生活故事，所呈现出的五味杂陈、悲喜交加的人生百态，或能清晰渐渐模糊的记忆，或能唤醒命运悲情的共情心，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人世间”的窗口。

为了生活，每一个打工人，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生活里的辛酸苦辣，总能击中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打工人”纪事》里所打捞的是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打工人的故事，时代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行业的变迁……每一个时代的打工人所需要面对的生存压力和职场危机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努力生活和梦想追寻的身影，乃至被时代淹没的悲喜交加，都能为当下的我们带来情感共鸣和精神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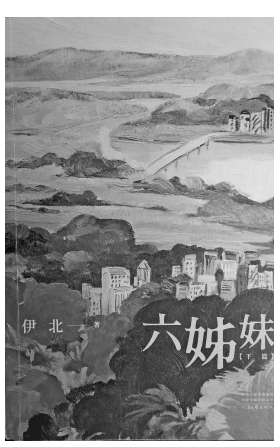
《杀猪匠一家的宿命》所讲述的是一家两代三个杀猪匠的故事，作为曾经令人艳羡的职业，与许多传统老行当、老手艺一样，被时代淘汰似乎已成为它们的宿命，而被时代裹挟的杀猪匠，无力逃脱命运的颠沛流离，唯有一声叹息，向我们讲述着逝去的故事。《40年晃晃悠悠，流过国营理发店》里的“小理发店”是一道充满沧桑的风景，40年的时光河流流过国营理发店，理发师的人生起伏含有太多的辛酸苦辣。当都市里的发廊比比皆是，“小理发店”里旧时光的温暖记忆是我们回不去也忘不掉的记忆。老行当渐渐在时光里走散，而兴起不久的图书邮购也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里，加速远离我们的视线，不愿放弃这份简单重复的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份职业“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对信仰的坚守和对某段时光的怀念吧”。时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但他们都在努力地活着，追寻着生活给他们留下的希望的光。

“打工人”不仅仅是一种略带黑色幽默的身份认同，也是一种为了更好生活而奋斗的人生态度，在平凡中流露出梦想追寻，倾注着许多关于尊严、认可、爱和希望的愿景。《雪山深处的骑手，全村唯一的希望》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故事，大雪长时间封闭的山村里，一人一骑串起留守老人和山外的希望，当扶贫攻坚的春风融化冰雪，骑手虽然失去这份工作，但他迎着风雪骑行的身影，“带着他的勇敢，无所畏惧，还有温柔与爱”，镌刻在无声岁月里。《西南大山的隧道，每一米都有生命作代价》讲述了隧道工程建设人员努力奋斗的故事，他们或因理想，或为生活，投身到艰苦异常西南大山的隧道建设中，他们没有壮志豪言，只有默默掘进，每过一关都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都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才能让隧道一寸寸向前推进。他们是被人忽视的“英雄”，而“在离他不远的隧道深处，还有更多的人和故事是看不见的”。期待自己被淘汰的“陪诊师”，为他人复活逝去爱宠的“复活”宠物店店主，还有希望实现“北京梦”的水果摊摊主……他们的梦想很小，也很大，每个人的生活都经历过跌宕起伏，日复一日、五味杂陈的辛劳，也不能阻挡他们渴望改变的内心，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逐梦路上充满着希望与力量。

人人都是生活的“打工人”。《“打工人”纪事》呈现了真实的打工人生活，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的幸福时光，少些怨天尤人，少些抑郁迷茫，即便身处逆境，哪怕被时代淹没，都应该拼尽全力奔赴更好的明天。

# 每个家庭里都有一根“定海神针”

□禾刀



《六姊妹》

伊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

一个家庭多大的事才算是大事？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相同的是，一旦摊上什么大事，应对有方的家庭一般都有一根“定海神针”。作为文坛新秀，伊北先前推出的《熟年》改编电视剧后曾在央视热播，《小敏家》的电视版曾创下较高的收视率。

在伊北的这个故事里，何家从来都不缺大事：从顶梁柱受人欺侮，到子女就业困难，再到个人婚嫁大事，七七八八，零零总总，不见消停。如果把历史比成一条长河，那么每个家庭的叙事就像是汇聚这条长河的涓涓细流。

六十多年前，扬州江都何常胜、刘美心夫妇响应国家政策，来到皖北淮河岸边的一座寻常小城。何家的故事与那个时代的重男轻女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夫妇俩一直想生个儿子“争口气”，好不受人欺侮，于是呱呱地一口气生了何家丽、何家文、何家艺、何家欢、刘小玲、何家喜六个丫头，最终还是没能生出个儿子。而何常胜的“死对头”大老汤生了三个，却个个是儿子，就在大家感到何常胜永无出头之日时，大老汤却传出家族有糖尿病遗传基因，从大老汤到三个儿子，无一善终。

大老汤与何常胜的恩怨据说来自上一辈，到头来也没人能理出个虚实是非。但手上有点小权的大老汤却笃信不疑，只要乐意，他就会随时随地变着法子整何常胜。何常胜越是挨整，就越想生个儿子，似乎有了儿子，他的这种窝囊命运才会逆转。

大老汤与何常胜有过和解，是两人唯一的一次合作——这对“死对头”不想因为儿女结成亲家，于是联手拆散汤家老大和何家长女间的姻缘。不知是否因为兼顾读者的感受，伊北有点手下留情，对大老汤这一角色没有进一步延伸，将他的“未筹壮志”交给了时代——随着特殊年代的翻篇，大老汤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整何常胜，他的那种扭曲人性顿时找不到发挥空间，转瞬陷入无法自拔的病态。

生活就像是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父母亲往往希望儿女长大成人后都能呆在身边，但儿女们常常有一颗出走叛逆之心。何家丽执意下乡像是对家庭的一种逃离。何家艺的出走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极端，她与有十兄弟的欧阳宝的最初联系，显然带着赌气成分；何家欢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她的出走看似因为单相思，实际上也是因为想努力挣脱家庭束缚；刘小玲更不用说了，中间有许多年被迫四处逃亡，还搭上了几段莫名其妙的婚姻；老幺何家喜倒是最“粘”母亲的女儿，结婚后还搬回了母亲身边，但那只是出于算计，当利益无法兑现时，果断出走。出走是常态，也是必然，这是家庭发展的必然走向、伦理的必然分支。

有一个人物比较有意思，朱德启老婆。她的每一次出现几乎都会带来上至国家下至街坊的各种大事，开口便是“不好了，不好了”。她对故事发展的推动意义仅仅在于不断“出题”，这其实也是时代和生活赋予的命题。当这些大大小小的“考题”出现在何家人面前时，每个人的感受就像是一种解题方案。何家原来是何常胜“说了算”，何常胜走后交给了何家丽，再后来经历曲折，眼看家要“散”了，大家又开始敬重这位任劳任怨的大姐。

每个家庭里都有一根“定海神针”。何家的“定海神针”原来是何常胜，后来这根“接力棒”交给了长女何家丽。俗话讲，长子如父。何家丽是家中长女，无异于长子，特别是在父亲陡然走后，她不得不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以前是父亲在，这个家就在。后来是她在，这个家便在。

在这个平凡的家庭里，生活似乎没有特别好，似乎也没有特别差。他们的成功与惊天动地无关，所谓的大事终究不过是柴米油盐里的锅碰碗碗碰锅。生活也许就是这样：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注定是平凡的，柴米油盐才是他们的“终身”大事。